

“这回还得求救于北平”^[1]

——老舍创作《四世同堂》的心态及动因探源*

王鸣剑

(重庆工商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 重庆 400067)

[摘要] 抗战后期,老舍在重庆北碚创作的《四世同堂》,是他经过艰难而曲折的阵痛后,从为抗战服务的通俗文艺转向文学生命本真的小说的集大成者;而妻子胡絮青从北平的到来,则弥合了老舍在沦陷区生活经历的匮乏和北平故土记忆的遥远,从而使沦陷区人民的苦难与抗争,在他笔下的北平市民的日常生活里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从中也映照出他们夫妻患难真情的身影。

[关键词] 《四世同堂》;创作;心态;动因

[中图分类号] I207.4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0598(2008)02-0114-05

在抗战后期的北碚,老舍从北平来奔的妻子的述说中,找到了表现故乡人民在日寇统治下的苦难与抗争的途径。于是,他以广阔的艺术视野,浓郁的激情和文化反省的视角,将自己的家国之思和忘国之痛,凝聚成民族的“痛史”和“愤史”:《四世同堂》。从而,令人信服地发掘和揭示出了中华民族不可征服的内在原因。

老舍始终认为:“一个文化的生存,必赖它有自我的批判,时时矫正自己,充实自己;以老字号自夸自傲,固执的拒绝更进一步,是自取灭亡。”^[2]抱着这样的反省意识,老舍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心态是复杂的:一方面,对中庸、保守、软弱、敷衍、自私等国民劣根性不满;另一方面,又对传统礼俗、家庭温情和民族精神心存留恋。这种创作心态和动机,几乎贯穿在他的整个创作之中。虽然,期中也因时势的变化有所游离,但最终仍然回归到了对国民性的文化反思之中。

早年写于英伦的《老张的哲学》、《赵子曰》和《二马》;在任教期间创作的《离婚》、《牛天赐传》、《月牙儿》、《我这一辈子》等小说,老舍在融入自己亲自经历和切身感悟的基础上,对北平街头巷尾市井细民的生活场景,进行了幽默风趣的再现。随着创作的成熟,他在对市民社会里的邪恶势力和国民

劣根性进行嘲讽的同时,加重了对人间不平的抨击力度,笔调也由轻松渐次沉重。

我们知道,老舍不喜欢教书,只是迫于一家人的生计,不得已才“以教书为正职,写作为副业”的。这种生活方式使他倍感不快,一心想做职业作家。在妻子胡絮青的支持下,他在1936年夏天,背水一战地辞去了“山大”的教职,专心写《骆驼祥子》^[3]。小说以严峻的现实主义方法,写出了人力车夫祥子从自重自信到自甘堕落的不幸命运,表现了老舍对于城市贫民的真挚同情和深刻理解,不仅使之成为“一本最使自己满意的作品”^[4],而且还因之奠定了老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正当老舍在妻子胡絮青的帮助(辞职回家照顾孩子和操劳家务)下,潜心自己的创作,并取得较大成绩时,他所关注的北平市民生活的创作之路,被中日战争阻断了。老舍在《我怎样写通俗文艺》中曾说过:“抗战改变了一切。我的生活与我的文章也都随着战斗的急潮而不能不变动了。”^[5]

战争把老舍卷进了时代的漩涡。1937年10月,济南沦陷前夕,他舍家别子、奔赴国难,只身来到武汉。1938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老舍被选为理事兼总务部主任,主管协会的日常工作,成为“文协”的实际负责人。为宣传抗战的需要,老舍义无反顾地放弃已经写了几

* [收稿日期] 2007-10-10

[作者简介] 王鸣剑(1964—),男,汉族,重庆梁平人,重庆工商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现代作家的感情心理和创作动因。

万字的两部长篇小说,开始有目的地写鼓词、坠子、相声、拉洋片等大众通俗文艺作品,1938年9月出版了通俗文艺作品集《三四一》。在民族危亡的年代,老舍充分发挥了以笔代枪的宣传鼓动作用。1939年6月,老舍随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劳代表团,从重庆出发,开始了南起襄樊,北迄五原,东达洛阳,西抵青海,行程一万多里的劳军活动。随后,他采取“旧诗新写”的方法创作了长诗《剑北篇》,以实际行动参与文艺界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接着,又为抗战需要,开始了话剧创作。或个人编写或与别人合作,老舍连续写了《残雾》(1939)、《国家至上》(1940)等九个剧本:有的号召民族团结,有的歌颂爱国将领,有的揭露“大后方”的霉烂堕落,抗战救国是这些作品的共同主题。

1941年前后,老舍在尝试了各种文艺形式后,发现话剧“全无是处”^[6]，“我不明白舞台的诀窍,所以总耍不来那些戏剧的花样”,“我老是以小说的方法去述说”^[7];通俗的鼓词与剧本,也“十分难写”;新诗又“真难”,散文又不敢“细写”,虽勉力为之,仍难尽如人意。老舍逐渐认识到自己的长处在于小说,而非通俗文艺和话剧。所以,在1941年后,他便自觉地放弃了通俗文艺的写作,开始考虑从宣传本位返回文学本位,从以话剧为首选文体逐渐转向以小说为首选文体,接续中断了多年的小说创作之旅。

二

可要从应时服务的通俗文艺和宣传所需的话剧回到体现自己文学生命的小说抒写,并非易事。老舍对艺术的要求甚高。他曾坦言:“写小说而失败,就仿佛没脸见人似的。”^[8]1940年11月17日,老舍在“文协”的小说晚会上说:“实在,要像《骆驼祥子》这样的东西,我已没有勇气再写了。我只觉得在生活上的经验不够,不敢写。”^[9]在《三年写作自述》中,他则进一步解释这种“在生活上的经验不够”的原因。老舍说:“我到武昌,汉口,宜昌,重庆,成都,各处‘打游击’,不敢动手写汉口码头的挑夫和重庆山城里的轿夫,因为对他们不甚熟悉;同样,对抗战中的政治、经济、生产、军事也较为陌生。”依我的十多年写小说的一点经验来说,我以为写小说最保险的方法是知道了全海,再写一岛。”^[10]所以,他在对待小说这一文体时,非常慎重,了解不多的,绝不动笔。经过思索与阵痛,老舍发现北平的故土记忆才是自己的“全海”,而感同

身受的战时生活经验又逐渐培养了他如何将北平与抗战结合起来,于是,他决定要用小说的体裁再现北平的记忆。

事实上,老舍的文学生命是与北平故乡的记忆联系在一起的。他曾说过:“我生在北平,那里的人、事、风景、味道,和卖酸梅汤、杏儿茶的吆喝的声音,我全熟悉。一闭眼我的北平就完整的像一张彩色鲜明的图画浮立在我的心中。我敢放胆的描画它。它是条清溪,我每一探手,就摸上条活泼泼的鱼儿来。”^[11]正因为老舍对北平的生活了然于胸,一下笔就如鱼得水,游刃有余,令人刮目相看。《离婚》《骆驼祥子》《断魂枪》《月牙儿》和《正红旗》等作品,莫不如此。

老舍将小说视为自己的文学生命,时时希望“返归自己的园地”,当这种计划渐次落到实处时,他便付诸行动。1942年7月19日,他宣布自己“打算,在今年秋后设法找个安静所在,去试写一篇长小说。”^[12]同年10月下旬,老舍在重庆陈家桥闭门沉潜,耗时两个月,才写下了四年以来第一个中篇小说《不成问题的问题》。这对于下笔如有神助的老舍而言,是值得反思的。其对小说的谨慎态度和认真精神,固然是其原因,更主要的偏离了他熟悉的北平记忆,因而写得生涩而艰难。他自己就说道:“两万字写了足足两个月,慢得出奇。”^[13]

1943年6月初,老舍来到北碚避暑,住在蔡锷路44号(后为天生新村63号副16号)的“文协”北碚分会。7月开始撰写以抗战为题材的小说《火葬》^[14],他本打算将其写成中篇,但写了五、六万字仍难收笔,遂改作长篇。因患盲肠炎住院做阑尾切除手术,而使原定10月中旬完稿返渝的计划落空。11月28日,胡絮青带着3个孩子,历经艰辛,从北平逃来,因战争而分离了6年的全家终于在北碚团聚了。在妻子的照顾下,老舍一边养病,一边继续撰写《火葬》,12月1日完篇,计有13万字。他从头细读一篇,认为花费“四个多月的光阴”写成的《火葬》是“失败的!原因有三:其一,“五年多未写长篇,执笔即有畏心;越怕越慌,致失去自信”。其二,“天气奇暑,又多病痛”,勉为其难,绝非“文艺创作”;第三,“故事的地方背景文城”,“它并不存在,而是我心里钻出来的。我要写一个被敌人侵占了的城市,可是抗战数年来,我并没有在任何沦陷区住过。”“这样一来,我的‘地方’便失去读者连那里的味道都可以闻见的真切。”^[15]《火葬》的传奇性和老舍的爱国热情,固然值得称道,然而,和

《不成问题的问题》一样,远离故土记忆和对故事背景(沦陷区)的生疏,导致了小说的致命弱点,缺乏真实感。据此看来,老舍要写沦陷区人民的抗战生活,似乎很难。可他为何在此后几年时间里,却创作了堪称描写北平沦陷后各阶层人民苦难和抗争的杰作《四世同堂》呢?

三

老舍虽然熟悉北平胡同市民的世俗生活,可并不了解他们在沦陷后的具体情况,而妻子胡絮青在北平四年多饱受国亡家破之苦的切身亲历,正好弥补了他“没有在任何沦陷区住过”的生疏感。

胡絮青来到重庆后,不少文化界的朋友纷纷前来打听北平的情况。她总是不厌其烦地把自己在北平四、五年间生活中的所见、所闻和自己的感想和愤慨,一股脑儿地讲给来访的朋友们听。此时的老舍就点着一根烟,皱着眉头,静静地坐在一边陪着听,时间长达两三个月。妻子的叙述触动了老舍梦牵魂绕的北平记忆,长期漂泊异乡,心中积满了故土情结。他总是认真地向妻子打听日本侵略者在北平的所作所为,市民的反应如何,北平亲友和一切熟人的详细情况。每当妻子谈起某人某事时,他就仿佛身临其境地补充一些细节。老舍对北平的了解,使胡絮青钦佩不已。有一天老舍对胡絮青说:“谢谢你,你这次九死一生地从北平来,给我带来了一部长篇小说,我从未写过的大部头。”^[15]这部大部头小说,就是近百万字的三部曲《四世同堂》。

众所周知,老舍在抗战时期主要是在大后方度过的,了解最多的是大后方人民的生活状况。按常情,写大后方抗战生活的小说他必然会得心应手,可他为何偏偏要去写自己未曾亲身体会过的北平沦陷区生活呢?胡絮青的到来,无疑是一个契机。妻子对北平生活的反复叙述,不仅为他的创作提供了真实的素材,激活了他心中沉寂已久的北平记忆;而且妻子的经历又触动了他“感时忧国”的爱国情怀,夫妻之爱、故乡之情与爱国之志的联姻,促使了抗战“愤史”《四世同堂》的诞生。

《四世同堂》分上、中、下三部,上卷取名《惶惑》,写于1944年,共34万字;中卷取名《偷生》,写于1945年,共33万字;两卷均写于重庆北碚。下卷取名《饥荒》,写于1947年至1948年,共14万字,在美国纽约完成。《惶惑》先在《扫荡报·扫荡副刊》(1944年11月10日到1945年9月2日)上

连载,1946年1月由良友复兴图书印刷公司出版。《偷生》先在《世界日报》(1945年5月1日至12月15日)上连载,后由晨光出版公司1946年11月分上、下册出版。第三部《饥荒》,前二十段(68—87)发表在1950年5月至1951年1月《小说》第4卷第1至6期(百花文艺和四川人民出版社在1979年初版)上;后十三段(88—100),因中文原稿亡佚,马小弥根据《四世同堂》的英译本《The Yellow Storm》(即《黄色风景》)译为中文,发表在1982年3月《十月》第2期,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年12月初版。至此,《四世同堂》的全稿,37年后才得以完整面世。

老舍写《惶惑》和《偷生》时,常常遭遇头昏与疟疾的困扰,胡絮青在生活上无微不至地照顾他,使他得以全身心地投入到创作之中。他后来给妻子取了一个新的名字:“家”。“老舍对很多朋友说,有关我的事情,你们去找‘家’,她做主,我只知道写作。胡絮青喜欢这个名字。”^[17]同时,胡絮青还以深厚的文学素养为老舍誊抄稿子,提出建议,修订错误。我们知道,胡絮青自幼喜爱文学,早在读大学时,就以燕岩的笔名在《京报》上发表过诗歌和散文,后又长期从事中学语文教学。1943年冬流亡重庆后,她又在北碚国立编译馆社会通俗读物担任编审。可以说,《四世同堂》的成功,凝结了胡絮青的心血与爱。

《四世同堂》以抗战时期北平西城一条小羊圈胡同为背景,以祁家四世同堂的生活为主线,旁及与祁家相关的十几户居民和各行各业的130多个人物,真实地再现了沦陷后北平市民家庭的不幸遭遇和沉浮兴衰,以及他们崇高的民族气节和不屈的抗争精神。同时,老舍在小说中还对日本侵略者的凶狠残暴,汉奸走狗、卖国贼的罪恶行径,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

小羊圈胡同的十几户居民,平静的生活被打乱了。这些普通的中国人,一夜之间被迫进入了一个梦魇般的世界。身为四世之尊的祁老太爷是一个倔强、正直、令人敬重的长者。八国联军打进北京的阅历,使他懂得了在国家民族大事上的是与非,爱与憎。儿子祁天佑上敬父母,下佑子孙,是一个正派的生意人,结果反受日本人的敲诈勒索,游街示众,被逼投河自尽。长孙祁瑞宣,是一位中学英文教师,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也不为日寇做事,同贤妻韵梅维持一家老小的生计。次孙祁瑞丰贪慕虚荣和享乐,在日本人和汉奸面前奴颜婢膝,结果

不得善终,丢妻丧生,死在了日本人手中。三孙祁瑞全年轻气盛,血气方刚,不愿做亡国奴,在瑞宣的鼓励下,毅然出走,参加了抗日,后又潜回北平,开展地下活动,杀死了他从前的恋人、作恶多端的日本女特务招弟。全家的心肝宝贝,祁老人的曾孙女小妞妞在日本投降前夕被活活饿死。小羊圈胡同的其他人,或抗争,被出卖,弄得家破人亡;或苟且偷生,认贼作父;有人被屠杀,有人被逼疯……这条小胡同发生的一切,成为中华民族反抗侵略的缩影。

四

《四世同堂》“是老舍化费气力最大、写作时间最长、他自己也比较满意的一部作品”,人物虽然是虚构的,却融入他梦魂萦绕的故土记忆。“小说中的那条小羊圈胡同,不但北平实有其地,还是老舍自己的出生地,就在护国寺北边,现在改名为同音的小杨家胡同了。”后来,胡絮青曾带着儿女到那儿实地观察过,“《四世同堂》里描写的小羊圈胡同的地形、房屋建筑和周围的环境,与现在的小杨家胡同很相似。”^[18]

正是怀着难以割舍的儿时记忆,老舍才将自己积郁已久的爱国之情和对妻子真挚的爱,有意无意地融进了瑞宣和韵梅的刻画之中。在老舍精心刻画的这两个典型形象里,渗透着他和妻子的性格、气质和感悟。比如,瑞宣在北平沦落后陷入忠孝的矛盾之中,就承载着老舍的忠孝传统思想。老舍父亲早逝,全靠母亲抚育,自小接受个人奋斗、凭本事挣钱吃饭的人生观念。初恋的失败,对母亲包办婚姻的抗争所带来的对母亲的愧疚和自责,使老舍形成了沉郁的气质,“比较谨慎、胆小”、“抑郁、矜持,给人以沉重感”^[19]。历史的沧桑感,使他在较长时间内心系宗教而疏离政治。在民族危亡之际,为国尽忠的爱国思想在惶惑中惊醒。在这个蜕变过程中,既有对小市民劣根性的不满,又有对自我留恋的自责。而这种气质,在描写瑞宣这个人物形象时再现出来。作为中学英文教师的瑞宣,在鬼子进城后,他犹疑于留与走、忠与孝的矛盾冲突之中。历经挣扎,他选择了留下来尽孝,但他并没有因之向敌人屈服,始终保持民族气节。他到英国大使馆工作后,又承受着被人误解和自我谴责的沉重的精神压力。

而在瑞宣的妻子韵梅身上,我们分明看到,老舍将对妻子的美德与爱折射在这个贤妻良母的典

型形象身上。韵梅作为一个没有受过新思想熏陶的旧式女子,具有传统的美德。她为了全家十口人的衣食住行,勤俭操持、无私奉献,连挑剔的祁老太爷也甚为满意。作为瑞宣的妻子,她不仅为丈夫分忧解难,而且在瑞宣被捕后不惜牺牲自己加以营救。她操持家务,竭尽全力地疼爱丈夫、养育儿女、侍奉公婆与祖父,从不奢求回报。老舍在突出她在家庭中所做的牺牲与贡献时,还表现了她的民族气节。她为人处世,总是奉行以忍为上的原则。可当他的“小顺儿”被日本孩子骑着时,她便萌生出“日本人灭了北平,所以日本孩子才敢这么欺侮人”的想法,故而不像平时那样将自己的孩子扯回家,而是跑过去伸手把一个日本孩子的脖领抓住,将他抡翻在地,并等着他的大人出来讲理。见日本孩子的大人没有来,她才“松了点劲儿,开始骂小顺儿:‘你没长着手吗?不会打他们吗?你个脓包!’”祁老太爷知道后,不满意她的树敌,加重了她的愤慨。从来孝顺不顶撞老人的她,“好像有一股无可控制的怒气,使她忘了平日的规矩。是的,她的声音并不高,可是谁也能听得出她的顽强与盛怒:‘我不管!他们要不是日本孩子,我还许笑一笑拉倒了呢!他们既是日本孩子,我倒要斗斗他们!’”^[20]这种勇敢的举动,连瑞宣也很钦佩。邻居方六被日本人抓走后,李四爷为救他,找街坊邻居签字作保,邻居们大都不敢,而韵梅却爽快地代瑞宣签了名,这种超凡的胆识使李四爷也大吃一惊。随着时代的发展,她逐步将眼光从狭隘的自家院落转向了外面的世界。韵梅形象的成功,自然得力于妻子胡絮青给老舍的真切感触。胡絮青虽然受过新思潮的影响,但她身上沉淀着更多的是传统美德。在抗日救亡的关键时候,毅然支持丈夫只身南下报效国家,独自一人担当起抚养儿女,孝敬婆母的重担。抗战后期,又以柔弱之躯克服重重困难,带着儿女们,历经艰辛来到老舍身边,照顾老舍。这种顾大局、识大体的宽广胸怀使老舍铭心刻骨,所以,他在创作北平人民在民族危亡之际抗击侵略者时,自觉不自觉地将对妻子的这种感激融入了韵梅身上,从而使这个形象成为一位具有民族气节的贤妻良母形象。

由此可以看出,《四世同堂》的诞生,既是老舍长期关注国民性的结果,又是他在抗战时期的重庆北碚,对中华民族血脉中固有的爱国精神的再思考。老舍从为抗战服务的通俗文艺转向回归生命本真的小说创作,其阵痛是艰难而曲折的。他之所

以能在异乡的北培,超越沦陷区生活经历的匮乏,将远隔 13 年后的北平故土记忆与沦陷区人民的苦难与抗争,恰到好处地诉诸笔端,妻子胡絮青的到来、诉说与帮助,功不可没。从某种意义上说,《四世同堂》是老舍和胡絮青夫妻患难真情的结晶。

[参考文献]

- [1]老舍.我怎样写《离婚》[A].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老舍研究专集(上)[C],37.
- [2]老舍.大地龙蛇·序.文艺杂志(第1卷)[M].1942.2.15.(2).
- [3]宇宙风[J].1936.9.(25).
- [4]我怎样写《骆驼祥子》[M].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45-47.
- [5]老舍论创作[M].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57.
- [6]老舍.我怎样写《剑北篇》[C].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老舍研究专集(上),104.
- [7]老舍.闲话我的七个话剧[C].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老舍研究专集(上),130,126.
- [8]老舍.老舍书信集[M].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117.
- [9]蔡仪.理论·论争(第二集).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第二编)[M].重庆出版社,1989.1344.
- [10],[11]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老舍研究专集(上)[C],109,110,109.
- [12]老舍.答客问[N].时事新报,1942-7-19.
- [13]老舍全集[M].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14):329.
- [14]文艺先锋(4卷)[J],1944.1,(1).(6).
- [15]我怎样写《火葬》[J].收获,1979,(2).
- [16]胡絮青.谈老舍.凡夫阿亭选编名人的妻子忆丈夫(A卷)[M].珠海出版社,2002.9:259.
- [17]刘明银.老舍与胡絮青之恋[J].美与时代,1998,(1).
- [18]胡絮青.谈老舍.凡夫阿亭选编.名人的妻子忆丈夫(A卷)[M].珠海出版社,2002.9,260.
- [19]吴小美,古世仓.老舍个性气质论[J].新华文摘,1999,(4).
- [20]老舍.四世同堂[M].北京出版社,1984.306

(责任编辑:朱德东)

“ This time , the help is still expected from Peking ”

——Analysis of Psychology and Motive Power of Lao She ' s Four Generations in One Household

WANG Ming - jian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67, China)

Abstract: Four Generations in One Household, which was created by Lao She in Beibei of Chongqing during the late period of Anti - Japanese War, is a masterpiece of his novel evolution from general art serving Anti - Japanese War to real literature life after he experienced difficult and tortuous labor pain,. However, his wife, Hu Xieqing who came from Peking, filled his shortage of life experience in the areas occupied by Japanese Army and shortened the distance of his memory of his hometown Peking, so that his description in this novel sufficiently shows the pain and struggle of the people in the areas occupied by Japanese Army and the daily life of Peking residents. Four Generations in One Household also reflects the real feelings between him and his wife through the hard time.

Keywords: Four Generations in One Household; creation; psychology; motive power